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与中国的作用

贺文萍

内容提要 始自 2003 年初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近年来迅速上升为新的国际热点问题，且由于中国和苏丹有传统友好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达尔富尔问题也成为国际上一些组织和个人用来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而“沾染”上“中国因素”的达尔富尔问题反过来又进一步高调占据国际媒体。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生态恶化导致该地区部落间的利益冲突。达尔富尔问题从苏丹内部一个地区的生态战争“升级”为一个高度国际化和政治化的政治与外交战争，主要源于该地区局势趋于恶化、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活动的警示作用，以及美国政府的高调介入。而后者是最主要因素。中国主张用对话和谈判、发展与合作的方式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目前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是至关重要和有效的。

关键词 苏丹 达尔富尔问题 根源 中国立场 作用

作者简介 贺文萍，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室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07）。

始自 2003 年初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近年来迅速上升为新的国际热点问题，且由于中国和苏丹有传统友好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达尔富尔问题也成为国际上一些组织和个人用来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而“沾染”上“中国因素”的达尔富尔问题反过来又进一步高调占据国际媒体，成为如今的“焦点”问题。那么，达尔富尔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一些西方势力为何要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中国与苏丹关系同达尔富尔问题究竟有何关联？中国在该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该问题的发展趋势又会怎样？颇值得进一步关注。

达尔富尔冲突的根源

位于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面积约 50 万平方公里，约占苏丹全国总面积的 1/5，毗邻利比亚、乍得及中非共和国。该地区是苏丹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生活的大约 80 个部落，主要分为“阿拉伯人部落”和“黑人部落”两大部落集团。前者为放牧骆驼的游牧部落，主要分布在该地区的北部；后者为从事农业的部落，主要分布在该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区域。历史上，阿拉伯牧民和农耕土著黑人原本相互通婚、相处融洽。农民一般来说欢迎牧民在中部和南部区域放牧，与他们共享井水。即便各部落间因争夺水源或土地偶有小的冲突，但基本上能相安无事。该地区各部族还曾经在 20 世纪初团结战斗，共同抗击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达尔富尔过去曾是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的地区。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该地区遭受干旱和沙漠化的侵袭，导致农、牧民和牲畜赖以

生的丰富水资源和良田出现了大幅度退化。加之来自该地区北部,甚至乍得、毛里塔尼亚等国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大批迁徙到达尔富尔中部、南部寻找水源和草地,致使该地区人口数量过度膨胀,从 20 年前的 300 万人增至目前的 600 万人。^① 农民们因担心放牧会毁地,开始把地圈起来拒绝牧民进入。由于土地、食物和水日益成为稀缺资源,不同部落和村庄为了争夺这些稀缺资源而发生的摩擦与冲突明显增加。为在冲突中获胜,一些大部落开始发展起自己的民兵武装。2003 年 2 月,由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the Sudan Liberation Army, SLA)和“正义与公平运动”(the Justice for Equality Movement, JEM)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达尔富尔问题也因此而浮出水面。

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于 2007 年 6 月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达尔富尔问题背后的“黑手”。苏丹南部降雨量在最近 20 年内减少了 40%。而此现象与印度洋地区气温升高同步,而印度洋气温升高又直接扰乱了带来降雨的季风,从而形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干旱。由于降雨减少,苏丹边远地区的生活物质变得匮乏,而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冲突就是在旱灾之中爆发的。因此,潘基文认为,在该地区建设持久和平必须从气候变化这一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着手。^② 苏丹政府在 2003 年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后专门成立的一个研究委员会在研究了危机的各个方面及其背景后,也最终认为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过去 20 年内该地区由于干旱和沙漠化造成环境状况的恶化,致使一些部落的人背井离乡,从而引发了对牧场、水资源竞争的加剧,进而发展为地区内各部落团体的武装对立。^③

这既然原本是争夺土地和水资源的生态战争,又是如何演变为当今政治与外交战争的呢?

达尔富尔冲突“升级”的原因

事实上,达尔富尔问题有若干因素促使此问题的“升级”。

首先,达尔富尔地区局势趋于恶化。自 2003 年 2 月“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以来,冲突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难民。目前,有关达尔富尔冲突导致的伤亡人数统计不一,出入很大。苏丹政府 2004 年 9 月公布 5 000 人死亡^④,最近又公布约 1 万人死亡、约 100 万人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曾采用约 7 万人死亡的数目,西方媒体常常报道 20 万人死亡、约 250 万人流离失所。^⑤ 更有甚者,近年来在西方媒体,以及在国际上有关“拯救达尔富尔”运动中十分活跃的美国史密斯学院教授厄瑞克·瑞夫斯(Eric Reeves)则将其在 2004 年 6 月使用的 10 万人死亡数字在半年内增至 2005 年初的 40 万人。^⑥ 尽管统计说法不一,但达尔富尔地区在此时期动荡加剧,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确是事实。

其次,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活动的警示作用。2004 年恰逢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为避免类似悲剧重演,国际社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图片展览和报告活动。达尔富尔冲突的部族和种族、宗教背景似乎容易使人产生又一场“种族屠杀”的联想。2004 年,围绕达尔富尔危机是否能界定为“种族屠杀”的争论可谓是沸沸扬扬。西方,特别是美国国内一些右翼基督教组织和反阿拉伯势力的

① 余文胜:《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由来》,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 年第 9 期,第 39 页。

② See Ban Ki-moon, “A Climate Culprit In Darfur”, *The Washington Post*, Saturday, June 16, 2007; p. A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6/15/AR2007061501857.html>.

③ 参见苏丹驻华大使馆 2004 年提供的资料:《为解决达尔富尔危机苏丹政府做出的努力》。

④ “Sudan’s Foreign Minister Says only 5000 Dead in Darfur”, News Article by Agence France Press, 8 September 2004.

⑤ 路透社联合国 2007 年 7 月 31 日讯; “Beijing boycott hot topic on Capitol Hill”, *USA TODAY*, http://www.usatoday.com/sports/olympics/2007-06-08-beijing-darfur-boycott_N.htm.

⑥ David Hoile, *Darfur in Perspective*, The European-Sudanese Public Affairs Council, London, 2005, p. 105.

利益集团竭力将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为“种族屠杀”，以便为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丹实施制裁，并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铺平道路。为此，他们刻意渲染北方阿拉伯游牧部落的伊斯兰宗教背景，及其背后的苏丹喀土穆伊斯兰政权，似乎淡忘了下列事实，即：与苏丹南部信奉原始宗教和基督教的黑人不同，达尔富尔的黑人居民与当地阿拉伯人均信奉伊斯兰教。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当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被指令在公开场合一定要避免用“种族屠杀”这个词，因为政府内部的一份备忘录认为，“如公开承认（种族屠杀），将迫使美国政府去做当时它所不愿做的事情（即干预）”^①。对此，苏丹政府也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认为达尔富尔问题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对卢旺达事件的失职感到良心责备的替罪羊”。有关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屠杀”的说法“纯粹是虚无的谎言”。因为，“该地区各种族早已进行大范围融合，难以用肤色和外貌区分个人的部族归属。该地区部落中也没有所谓纯阿拉伯的部落或者所谓未与其他部落通婚的非洲部落。因此，多年来的民族融合，使种族歧视和种族清洗这样的指控不可信。”^②

最后，美国政府的高调介入。这是最关键的因素。令人匪夷所思，尤其让苏丹政府和人民百思不解的是，从1983年5月至2005年初第二次苏丹南北内战是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共导致200多万人丧生、400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此前似乎从未引起美国对苏丹“人权”和“战乱”的过多关注。而2003年初新爆发并在2004年趋于恶化的苏丹西部达尔富尔问题却让美国表现出异常的“关心”。

美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兴趣”主要源于2004年总统大选。由于在外交领域奉行重实力、轻道义的单边主义政策，布什在竞选中饱受民主党攻击。为抓道义的旗帜，并同时与民主党克林顿政府在卢旺达人道危机上的无所作为形成对比，争取更多的黑人和基督教徒的选票（宗教团体、非洲裔人权组织等院外活动集团的施压是另一重要“推力”），同时转移国内媒体和公众对伊拉克乱局的关注及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兼具宗教、种族冲突背景，达尔富尔问题便成为布什的一个重要竞选砝码。^③

尽管联合国的报告，以及非盟、欧盟等均不认可用“种族灭绝”来给达尔富尔问题定性，但美国国会仍于2004年7月通过决议，认定达尔富尔冲突为“种族灭绝”（联合国对该地区冲突的界定是“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迫使联合国对苏丹采取制裁措施。自那时起，美国政府还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苏丹的议案，但由于安理会理事国之间有严重分歧而未能通过。无疑，用“种族灭绝”来定性易引起国际社会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进行“联想记忆”，从而为达尔富尔冲突的国际化 and 美国对苏丹内政的干预（甚至包括“政权更迭”）埋下了伏笔。^④

从本质看，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放大”达尔富尔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苏丹对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十分巨大。首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九一一事件后苏丹的独特地理位置对于美国全球反恐战的地缘政治意义凸显。美国在非洲的反恐战主要集中在非洲之角和撒哈拉中西部地区，苏丹是连结上述两片地区的重要纽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本·拉登及“基地”组织曾以苏丹为基地，策划了多起针对美国目标的恐怖主义袭击。因此，美国政府担心一旦达尔富尔局势失控，可能引发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在非洲的大规模渗透。另外，由于苏丹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保守估计至少有80亿~100亿桶），且从南苏丹沿上尼罗河直到与乍得接壤的达尔富尔地区也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不甘心这一资源宝库旁落，曾于20世纪70~80年代在苏丹勘探和开采石油的谢夫隆、埃克森等美国各大型石油公司也摩拳擦掌地希望重返苏丹。而把达尔富尔问题国际化，则有利于美国对苏丹现政权施压，以及未来对该地区石油资源分配的重新“洗牌”。因此，有美国学者尖锐地指出，“石油，而

① Scott Straus, "Darfur and the Genocide Debat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 p. 129.

② 苏丹驻华大使馆2004年提供的资料：《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事实真相》。

③ See David Hoile, op. cit., p. 97.

④ See F. William Engdahl, "Darfur? Its the Oil, Stupid...", *Financial Sense Guest Editorials*, May 21, 2007. <http://www.financialsense.com/editorial/engdahl/2007/0521.html>.

非人道灾难，才是华盛顿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新兴趣所在”^①。

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关联”

远在非洲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问题按理说与中国扯不上关系。正如中国非洲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所言，“达尔富尔并不是中国的达尔富尔，它首先是苏丹的达尔富尔，其次是非洲的达尔富尔。”^②然而，由于苏丹政府被西方广泛认为是纵容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民兵袭击黑人的幕后支持者，中国与苏丹政府的传统友好关系和近十多年来的石油密切合作，以及我们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亦被西方广泛理解为对达尔富尔地区人权的漠视，只重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顾非洲人权和“良政”的进步。因此，国际上一些对中国有成见的组织和个人借机把中国与达尔富尔问题相联系，莫须有地认为中国在苏丹投资与与苏丹现政府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合作，就是客观上为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推波助澜，中国因此应该为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负责，云云。^③在政府层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用“关注人权”、“孤立不尊重人权的专制政权”等为由，向中国政府施压，并发起从苏丹“撤资”的动议。2005 年 9 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曾将促进苏丹冲突的解决明确地列入希望看到中国负起国际责任的一项具体议程。

更有甚者，近一年来，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以及中国政府和民众迎奥运工作的实质性推进，国际上一些对中国抱有成见的组织，如“拯救达尔富尔联盟”（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和个人（还有不少是不了解中国对达尔富尔政策和对非洲外交的人云亦云者）又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将于 2008 年举办的奥运会扯在一起。他们声称，如中国继续对苏丹现政权采取“姑息”立场，将发起抵制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行动。^④由于持这一观点者中不乏影视界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如好莱坞著名演员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米亚·法罗（Mia Farrow），以及篮球界（NBA）著名球员纽伯（Newble），等等，因此，这一危险和愚蠢的舆论误导在普通民众中正在产生非理性的扩散，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舆论宣传都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⑤在美国政界，也有国会议员和 2008 年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加入了抵制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合唱”。2007 年 5 月初，美国 108 名众议员还联名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信，警告说中国如不能对达尔富尔的混乱局面采取措施，将对北京奥运会带来不利影响。^⑥6 月 5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涉华决议案，继续无端指责中国（包括中国从苏丹进口石油和与苏丹开展的其他合作等），并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钩。^⑦另外，噪音也从欧洲方面飘来。欧洲议会副议长斯考特公开呼吁，基于中国的人权，必须停止举办北京奥运会。他甚至说，苏丹危机使中国陷入困境，由好莱坞和政界人物组成的联盟切中了中国的“要害”^⑧。弥漫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恶毒舆论就这样人为地、莫名其妙地与中国，甚至与非政治化

① F. William Engdahl, op. cit.; 新华社喀土穆 2005 年 7 月 21 日讯。

② “Darfur issue unfairly played up; Envoy”, *China Daily*, 27 July 2007.

③ See “Special Feature: Darfur and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Africa* (e - Africa), Volume 2, November 2004.

④ See “Activists press China wit Genocide Olympics label”, <http://www.csmonitor.com/2007/0626/p13s01-woaf.html? page=2>; “Ad campaign seeks to shame China into loosening ties with Sud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29, 2007, <http://www.iht.com/articles/ap/2007/05/29/america/NA-GEN-US-China-Sudan.php>.

⑤ See “How Hollywood made America care about Darfur”, *Guardian* (UK), May 19, 2007, <http://www.guardian.co.uk/sudan/story/0,,2083438,00.html>.

⑥ See “Beijing boycott hot topic on Capitol Hill”, *USA TODAY*, http://www.usatoday.com/sports/olympics/2007-06-08-beijing-darfur-boycott_N.htm; “Richardson suggests U. S. boycott Olympics”, Jun. 5, 2007, <http://www.unionleader.com/article.aspx? headline=Richardson+suggests+U.S.+boycott+Olympics&articleId=2db3ef31-0de3-4b24-860f-b4ef6ea9695b>.

⑦ 参见《环球时报》，2007 年 6 月 8 日。

⑧ “Olympics are China's vulnerable spot when it comes to Darfur crisis”, http://news.monstersandcritics.com/asiapacific/features/article_1307414.php/Olympics_are_Chinas_vulnerable_spot_when_it_comes_to_Darfur_crisis; 以及《环球时报》，2007 年 6 月 6 日。

的体育赛事牵扯在了一起。

事实上,上述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所谓“关联”均忽视或无视中国与苏丹开展石油和其他经贸合作以来苏丹形势的巨大积极变化,及其对维持苏丹南北《全面和平协议》和全国政局稳定的作用。

首先,苏丹经济的强劲复苏与中国的深度参与密不可分。中国和苏丹是传统友好国家。自1959年2月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经贸往来发展顺利。1962年,两国签订了政府间第一个贸易协定。1993年4月,两国签订了新的经济贸易合作协定。我国先后援建了友谊厅、哈萨黑萨纺织厂、罕图布大桥、迈-格公路、辛加大桥、恩图曼友谊医院等多个援外项目,并承建了港口、房建、水利、电力、道路和桥梁等工程劳务合作项目。在能源合作领域,中国石油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参与苏丹的能源开发。截至2003年底,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共投入27亿美元,修建了1506公里的输油管道,建成了一家每年250万吨原油加工厂和一些加油站,不仅使苏丹从一个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而且拥有了一个集勘探、生产、炼制、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石油工业体系。^①此外,中国公司还注重提高当地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素质。目前中石油在苏丹的各个项目中都大量用本地员工,部分项目苏丹员工的比例达90%以上。中石油苏丹项目有关人士表示,通过培训苏丹本地员工,不仅满足了项目对人才的需求,也为苏丹培养了大批石油行业的操作工人和经营管理人才。中国与苏丹合作是利益共享,互利共赢。^②另外,中国还投资了两千多万美元帮助苏丹建设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

近十年来,苏丹经济在“石油美元”强大引擎带动下显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石油生产从1993年日产2000桶提高到目前的50万桶,2006年原油出口占总出口的比值达84%,^③经济增长率近年来均保持在8%~12%左右,在东北非国家中名列前茅。通货膨胀率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135%降到目前的5%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从90年代末的280美元增至目前的1080美元。外汇收入也逐年增加,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5年4月底,苏丹外汇储备已达14.4亿美元。苏丹因此能按期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受到该组织好评,并于2000年恢复其会员国的投票权。^④

其次,“石油美元”带动下的强劲经济增长反过来为苏丹南北《全面和平协议》的顺利实施,以及苏丹和平局面的巩固提供了经济基础和保障。2005年初签订的苏丹南北《全面和平协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苏丹南方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平分南部石油收入。据苏丹财政部的统计,南方自治政府在2006年头五个月里已收到总计4.73亿美元的石油分成收入,而且其月均收入呈快速上涨趋势,从2006年1月的7200万美元涨到5月的1.12亿美元。^⑤稳定的石油收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苏丹南方自治政府,以及喀土穆中央政府的预算困境,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苏丹南北《全面和平协议》的顺利执行,以及和平的巩固。正如苏丹能源和矿产部副秘书长哈马德·埃尔尼尔·加迪尔所言,“制裁苏丹的石油业,就等于是制裁苏丹的发展、和平和团结。”^⑥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

一些西方媒体和国际组织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下列两点:第一,在联合国

① 参见《中国石油石化》,2005年第16期,第40页。

② 参见《北京青年报》,2007年7月16日。

③ 苏丹能源和矿产部副秘书长哈马德·埃尔尼尔·加迪尔在2007年7月26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与苏丹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④ See EIU, *Sudan: Country Profile* 2005, 2006.

⑤ EIU, *Sudan: Country Report September* 2006, p. 24.

⑥ 哈马德·埃尔尼尔·加迪尔在2007年7月26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与苏丹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安理会讨论此问题时中国反对用制裁手段；第二，中国与苏丹现政府合作，对苏丹施加的压力不够。事实上，稍有国际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主张通过谈判、对话等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及地区冲突是中国一贯的外交主张。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也是如此。因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制裁只会加剧贫困，而贫困则加深矛盾；深受制裁之苦的是人民。总之，“破坏”比“建设”容易，“制裁”较“促和”容易，“破坏”和“制裁”解决的是问题和“症结”的表象（有时连短期的表象问题也解决不了）。只有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及外交上必要的灵活性和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裁”过猛，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和严重的副作用。从达尔富尔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矛盾的症结看，制裁和孤立苏丹现政权无益于解决问题，且会造成更严重的对立。自从 1997 年美国实施对苏丹制裁后，苏丹部族冲突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升级。2007 年 5 月 29 日，正当联合国、非盟与苏丹政府就有关苏丹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及非盟混合部队的“安南方案”第二阶段计划举行磋商、并有望达成协议之际，在美国长期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又宣布了对苏丹实施新的、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禁止美国公民和企业同苏丹政府控制的 30 家国营或合资公司及 2 名政府官员和 1 名反政府武装组织头目进行往来等。6 月 7 日，布什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参加西方八国峰会时还说，他对达尔富尔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表示失望，如果联合国不能采取有效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①。

当达尔富尔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已有积极进展，苏丹政府与联合国、非盟就安南方案第二阶段计划也已基本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美国却再次向苏丹抡起了制裁大棒，这使人怀疑美国对政治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诚意。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对苏丹实行新制裁只能使问题复杂化，无助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② 中国还表示，制裁苏丹无益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有很多例证都说明，即使派很多部队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该国内部的政治进程和当地政府的配合，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③

由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生态恶化导致的贫困和落后，“实质上是发展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发展与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鉴于此，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一直扮演着“劝和”、“促谈”的角色，主张立足对话和谈判、发展与合作来解决冲突。自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方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多种途径与各方沟通，力争缩小各方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胡锦涛主席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 2007 年 2 月初访问苏丹期间，均就达尔富尔问题与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谈，并提出了中国对解决此问题的四项原则主张，即：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非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地区局势稳定，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政府迄今共向当地提供了 8 000 万元人民币的人道物资援助，并向非盟在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的特派团捐款 180 万美元。

为推动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中国积极推动有关各方进行政治对话，以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2006 年 11 月，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非盟，以及苏丹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联合国分三阶段向非盟驻达尔富尔部队提供支援的计划，即“安南计划”：第一阶段，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价值 2 100 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并派遣近 200 名军官、警官和文职官员，在非盟部队中担任参谋和顾问等职务；第二阶段，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将达到一定规模；第三阶段，在达尔富尔完成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这支部队将由 1.7 万名军人和 3 000 名警察组成，其指挥权将由联合国掌握。中国支持这一计划，认为

① 新华网海利根达姆 2007 年 6 月 7 日讯。

② 参见新华社 2007 年 5 月 31 日讯。

③ 新华网北京 2007 年 5 月 29 日讯；“Confrontation over Darfur ‘will lead us nowhere’”，*China Daily*, 27 July 2007.

它是现实可行的。希望苏丹与其他有关各方就细节问题进行平等磋商，并尽快达成一致。

为实地了解情况，中国政府已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 5 个特使团。2007 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两次访问苏丹，并在同年 4 月作为政府特使第二次访问苏丹时前往达尔富尔地区考察当地形势，并提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应从三方面入手，即：有关各方应推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和平；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减轻和化解人道主义危机；为达尔富尔地区的发展提供帮助，使该地区人民摆脱贫困，消除冲突根源。同年 5 月 10 日，中国政府又任命了资深外交官刘贵今大使为首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其近期工作将重点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此举为中国政府继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和朝鲜半岛事务特使之后，第三次任命特使，清晰表明中国对非洲事务，特别是近期对达尔富尔问题的高度重视。刘贵今大使上任后，即赴苏丹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他不仅赴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分别会见了苏丹副总统塔哈、总统顾问哈里发和外交事务国务部长萨马尼，希望和劝说苏丹在落实“安南方案”问题上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以更大的力度加快推动达尔富尔地区政治进程，进一步改善该地区人道和安全状况，使达尔富尔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在中国的努力下，苏丹政府于 2007 年 6 月宣布无条件全面接受联合国和非盟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混合维和部队的行动方案，使得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应当说，苏丹政府立场的转变，中国起到的建设性作用是至关重要和有效的。为切实推动“安南计划”第二阶段方案的实行，中国政府应联合国有关方面的请求，还决定不久将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 315 人组成的工兵分队。对中国在推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有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战略是进行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施加影响但不进行干涉”，并得出了“中国对达尔富尔的政策眼光更长远”的结论。^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6 月 4 日也首次称抵制北京奥运“并非美国政府的看法”，也“并非我们所支持的行为”。美国奥委会则认为“奥运会是体育，而不是政治”。^②

达尔富尔局势的未来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在国际社会、苏丹政府等有关各方的努力下，目前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已有实质性进展。2007 年 7 月 31 日，联合国安理会已一致通过第 1769 号决议，决定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约 2.6 万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苏丹政府翌日宣布接受此决议。随着维和方案的尘埃落定，实施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路线图”也提上了日程。8 月 6 日，非盟和联合国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共同召开有关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的国际会议，与会 7 个达尔富尔地区反政府武装派别领导人达成一致，准备尽快与苏丹政府开始进行政治谈判，重申愿与各方共同遵守停止敌对行动的承诺，并欢迎联合国第 1769 号决议的执行。可以说，达尔富尔问题已初现和平曙光。随着“安南计划”第二、三阶段方案的实行，驻扎在达尔富尔地区的非盟，以及联合国部队的装备和规模都将有很大的提升，这无疑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当地安全局势和确保人道主义救助的顺利实施。由此可见，只要有关各方协调一致，用真诚和实际步骤消除当事方的疑虑与猜疑，本着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的态度，达尔富尔地区实现和平并非不可能。当然，我们也看到，由于达尔富尔地区部族矛盾和发展面临的困境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因争夺利益而爆发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也很难杜绝，加之目前政治进程刚刚启动，该地区派别武装的分裂速度又在加快，因此要想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也并非易事。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① 参见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7 年 7 月 23 日。

② 《环球时报》，2007 年 6 月 6 日。

The Darfur Issue and China's Role

He Wenping

pp. 5 - 11

The Darfur issue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est clashes between the local tribes caused by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reason that the Darfur issue is escalated to be a highl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war from a regional ecological war in Sudan is mainly that the situation in Darfur has been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the decade memorial activities for the Rwanda genocide gives the inspiration and the

U. S. government gets involved, among which the U. S. involvement is the major element. China advocates to solve the issue by way of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Up to now, the political solution of the Darfur issue has made substantive progress, which has once again proved that China's constructive role in solving the issue is vitally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Adju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O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ew Century

Yang Guang

pp. 12 - 18

In 1980s, because of the sharp fall of oil price and inadequ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Middle East economies lagged and the countries in this area began to adjust their economies in the forms of macro - economic stabilization, capital deployment marketization,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privatized and trade system freedom. Comparatively, the unimportant oil export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actively promote economic adjustment in

norm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improving the macro - economic situations, diversifying the investment sources and upda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 But their economic adjustment had been too slow an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adjustment and stability had been more and more obvious, which restric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ystem adju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hina - African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Ca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Zhang Yongpeng

pp. 19 - 24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cases is an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the basis of which is the simi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shared identifica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both being confron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ask and challenges. China - Afric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seeking for independence, peac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The history and features of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show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is based on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the nature of which i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is inoffensive, aiming to safeguard world peac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nd benefit the progress of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society.